

張承志：守衛昨日之夢

——從《金牧場》到《金草地》

◎ 許子東

一 《金牧場》與《金草地》

張承志的《金牧場》完稿於1987年初，同年10月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印行了精裝、平裝兩個版本。張承志聲明說這「是我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¹。《金牧場》或可視為張承志創作中的一個很關鍵的轉折：這是一次「把二十年思索獲得的思想裝進一個框架」²的精神總結，也是作家心理上的「一次真正的成人式；是告別我這已經太長的青春的祭典」³。這個長篇也透露了他日後的書寫方向：以伊斯蘭某教派的殉道精神來批判和拯救當代中國文化。《金牧場》也是張承志在小說形式上一次頗具野心的試驗。自《金牧場》以後，他開始放棄小說敘述，轉用歷史研究（史詩？）和散文詩來繼續他一貫的浪漫抒情。

放在整個文革後中國文學的發展背景上看，《金牧場》亦是當代作家第一次在長篇格式裡以結構主義觀點敘述種種複雜的紅衛兵-知青心理經驗。《金牧場》裡既有韓少功同情的知青顏唐（《飛過藍天》⁴）和梁曉聲謳歌的知青理想（《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⁵），也有尋根派的尋找精神家園的主題以及類似史鐵生式的鄉民學生情感溝通。而且，作為「紅衛兵」這一名稱的首創者，張承志在《金牧場》裡為「紅衛兵精神」作了曲折而又明顯的詮釋。除了他後來以日文出版（又拒絕「譯」成中文）的《紅衛兵的時代》（岩波書店，1992）以外，《金牧場》可以說是張承志用文學方式討論中國紅衛兵運動的一個重要文本。

1994年下半年，張承志通知作家出版社，「永遠停止了《金牧場》的再版」⁶。作家自己的解釋，是「為這部長篇小說的不成功遺憾」⁷。評論家理解，則是作家為了「減輕自己《金牧場》情結的痛苦與羞愧」⁸。與此同時，張承志將三十萬字的《金牧場》刪改成了一部十六萬字的長篇，改題為《金草地》，1994年9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印數5,000。

張承志為甚麼會對《金牧場》如此不滿乃至要「重寫」呢？本文所感興趣的，是《金牧場》和《金草地》的兩個文本之間的結構差異，即《金草地》對《金牧場》的具體改寫過程。

《金牧場》在1987年是當時紅衛兵-知青精神歷程的一個文學總結。到了出版《金草地》時，張承志已成為當今中國（大陸）頗令人注目也引起爭議的「抗戰文學」的旗手⁹。因此，考察一下從《金牧場》到《金草地》這七、八年間，作家想刪除些甚麼、修改些甚麼，保留些甚麼、發揚些甚麼，也許可從中一窺從尋根反思文學到「抵抗投降」的新左派思潮之間的若干發展線索。

《金牧場》分上、下兩部共十章。每章均由J部和M部及黑體字段落三部分組成。而在J部和M部裡又各有主、副兩條敘述線索。J部的主線是小說主人公「我」在日本東京做訪問學者的生活實景，副線是主人公若干年前考察青海、新疆時的印象片段。M部的主線是「我」在文革中期於內蒙草原插隊放牧的現實經驗，副線則是「我」在文革初作為紅衛兵沿紅軍長征路線步行串連的回憶線索。黑體字部分則大都是較抽象的散文詩或寓言。在上部中每章的秩序是黑體字-J-M，在下部則改為M-黑體字-J。無論在J部和M部，主線和副線通常是有規則地每隔數頁間隔切換，但有時也會攪拌混雜一起，隔段甚至隔句跳躍。有些局部有意識流，但總體上是有規則地布局：以共時態的結構並置原本歷時態發生的四個故事、四種生活狀態：留日、考察、插隊、「長征」。或者可以說是主人公的四個身分、四種心情被並置在一個敘述平面上：中國人、學者、知青及紅衛兵。

簡而言之，《金草地》刪改了上述留日和插隊的生活實景，保留和重申了大西北考察和紅衛兵「長征」的心理狀態。在敘述層面上，可以說《金草地》是在刪除「故事」，保留「抒情」。

二 被刪除與被修改的

《金草地》對《金牧場》的第一刪改重點就是留日生活實景。貫穿《金牧場》全篇的主人公「我」在東京的生活大致由下列四個部分合成。一是現代都市氛圍的壓迫（及一些令「我」厭惡的人與事）；二是兩位「正面」的日本人形象：「我」的研究夥伴平田英男與女友夏目真弓；三是「我」對搖滾歌手小林一雄的歌曲的痴迷；四是轉述60年代日本左翼「全共鬥」在東京大學造反被鎮壓的歷史。在《金草地》裡，上述第一、二部分完全被刪除，第三部分刪去了「我」的痴迷只保留歌詞，只有第四部分完全保留。

長篇《金牧場》開始於主人公「我」搭乘國際航班赴日。雖然「襯衫的硬領卡著脖頸」，要威士忌須用生硬外語且有漂亮空姐來提醒他「"No Smoking"」，但主人公在看到富士山影再抵達「新東京國際空港」時，還是「意識到自己正被一股興奮攫著」，「有一種……終於達到了目的的快樂」¹⁰。作家巧妙地使用了乘客在飛機降落後感到耳鳴及聽覺短暫消失的細節，讓主人公先暈眩於一個絢麗濃烈而又無聲的都市夜景，「海上火災」、coca cola、資生堂男性化妝品、美Ling……然後突然，主人公恢復了聽覺，光怪陸離的燈影頓時變成「令人頭顱膨脹」的尖銳噪音塵世轟鳴。從此以後，主人公一直對現代都市的繁華喧囂感到煩躁和壓抑。他住在宿舍裡，感覺像牢房¹¹；他百無聊賴打電話，人們都在庸俗地忙碌，並不在意他的孤獨；他去大學上班，只感到「一些硬白領和考究的衣料逼近又離開」，而「自己的軀肉在硬硬的西服裡正一陣陣地掠過一種痙攣」¹²。他大量地喝「純」酒，甚至也去「歡樂街」，雖沒有像前輩留日作家郁達夫的主人公那樣真的「為國沉淪」，卻也在抹滿脂粉的女人和性病醫院廣告前，又噁心又悵惘地聯想到「每個中國留學生每個亞洲人在東京，都覺得自己在挨著欺負和侮辱」¹³。

夏志清教授早指出過留學環境對中國現代作家思想及藝術傾向所可能產生的影響：「我們即使把自由派與激進派的紛爭看做留美、留英學生與留日學生的紛爭也不為過。」¹⁴張承志的個人氣質與藝術取向當然和前後期創造社作家不同，可是在他那裡，我們卻再一次看到中國作家如何在東洋鄰國痛切感受祖國的屈辱地位。《金牧場》主人公激動焦灼的民族主義情緒和五四留日作家們當年的屈辱感的基本區別在於：郁達夫等是首先感受個人的心理情欲苦悶

並訴諸藝術的形式，然後再隨著20、30年代左傾思潮的發展，才逐漸使用較系統化的民族-國家語言來詮釋他們的浪漫情緒¹⁵。而張承志是在一個民族-國家語言高度系統化、制度化的文化環境裡成長並開始識字和寫作的，所以《金牧場》主人公的幾乎任何生理感官觸覺，都有意無意地滲透著民族-國家意識。比如他討厭日本教授大湯常喜，不僅因為大湯肥胖、禿頂，更因「大湯在他剛剛來到這間研究室時向他問了一個侮辱意味的問題：『您還回中國嗎？』」¹⁶中國姑娘胡彩霞，因嫁人改名「鎌田枝子」，自然使主人公十分不悅¹⁷。小說裡勾勒了不少中國學者的「無恥」：「陳先生每看見一座樓就嘖嘖地說一聲嘿瞧人家這樓」；麥先生抗日期間曾就讀滿洲國立大學，所以是漢奸；而周先生看上去「氣度軒昂、彬彬有禮」，也「憂國憂民」，「痛貶時弊」且「一生坎坷」，但主人公特別感到噁心，因為周先生講演時當眾「哽咽」：「決不能讓悲劇重演啦——嗚嗚嗚！」《金牧場》中被戲謔漫畫的「丑角」大都不是日本人（除了大湯），而是有失尊嚴的同胞。周先生錯在哪裡呢？並不僅僅因為「男兒落淚」，《金牧場》的主人公也常常在小林的歌聲或友人的目光下幾乎落淚；也不全因「出賣苦難」，主人公也自嘲他的草原抒情為「賣血」（「我的血能記憶」）。看來關鍵仍在內外有別的「家醜」意識。「你對著日本人哭甚麼是你遇上知音啦，還是你在這兒裝洋蒜——你哭可以回家以後對著你老婆哭個夠嘛」¹⁸。這是對矯情的真誠憤怒，但憤怒方式也有些誇張。更戲劇性的細節發生在主人公漫步東京街頭時，街上既有右派的宣傳車也有左派人士尋求捐款，但最出乎意外的是突然有個老人在雨中跪在身著中裝的主人公面前¹⁹：

濕人直硬硬地，咚地跪在雨水裡，嗚嗚地哭了起來。那柄傘撇在水窪裡，在風雨裡緩緩地翻轉。接著濕人開始撕自己的頭髮。他（主人公——引者註）的心猛地一抽。

「中國……」那人揪扯著頭髮哭泣著。

這是一個原來的日本兵。……

小說主人公「盡力忍住心裡的激動，和顏悅色地」扶起當街跪著的老人，但卻拒絕和老伯一起去喝杯茶，拒絕聽那昔日日本兵的懺悔。「他突然心情惡劣。他挺直胸脯，把雨傘舉正，拔腿離開了那個老人。我不是中國外交部……我不願冒領失物，冒充個接受贖罪的人物，我討厭人人冒充中國外交部」²⁰。主人公既推卻（也捍衛）國家的名義，但整個情節的設置恰恰突出和強化了個人和國家名義之間的關係。其實，外交部是否就一定能代表國人接受贖罪？人對戰爭的感悟是否必須納入國與國的關係中去思考？有意思的是，主人公後來在生活壓力日甚、心情煩躁苦悶之時，常會漫步繁華街頭，暗暗期待再遇見老兵。這個細節極具象徵內涵：這（同代人的通病）是以昨日的苦難來慰藉今日之焦灼呢？還是（像前輩一樣）以民族-國家語言來解救個人情感危機？

《金牧場》裡的東京並非黑暗一片，平田英男和夏目真弓便分別代表了主人公所欣賞的日本人踏實理性的工作態度和絢麗神秘的美感。平田和主人公合作，一起從事中亞古文獻《黃金牧地》的研究和翻譯。在主人公生病、潦倒及工作受挫時，平田總是默默相助。真弓小姐的形象更複雜些。她不僅美麗多情，也極有主見；不僅在街頭募捐，也著迷人的和服為主人公跳舞、插花，而且能洞見主人公的內心，「你顯然受了中國伊斯蘭教的遭遇的刺激」，一語中的。張承志後來在《金草地·序言》中特意介紹真弓是「出身被歧視的部落民的日本基督教徒」。與主人公傾心於「人民的暴力主義」²¹不同，真弓崇拜馬丁·路德·金。政見雖有不同，但不妨礙真弓說主人公像她從前的戀人，臨別之際還告訴以男子漢野性自許的主人

公：「你的臉真美！……」²²

所有這些故事，在《金草地》裡都被刪除了。

東京故事在《金牧場》中從來都不是單獨存在的。結構主義布局的基本效果就是1加1加2並不等於4。在每章的J部，喧嘩都市總伴隨著大坡戈壁畫面：其間透出「回漢」、「中日」雙重的民族對峙；再與M部的知青苦難、紅衛兵長征構成呼應對照，於是異國奮鬥又接續了青春反叛傳統。

為甚麼張承志不惜拆掉這多重含義的敘述結構，在《金草地》裡裁掉絕大部分的異國背景呢？在我看來，主人公的東京經歷，並不僅是為了增加《金牧場》的現代氣氛和可讀趣味的異國情調，也不只是對日本的批判或美化。更重要的意義在於：這是重新詮釋紅衛兵精神、重新理解知青（及草原）苦難的一個當代參照——守衛昨日之夢，正是基於今日的危機感。抽掉東京背景之後的《金草地》，基本上也就淡化了《金牧場》的兩個基本抗爭主題之一：民族屈辱感（或許這也是因為作家已將這條抗爭線索轉移到《心靈史》及《清潔的精神》等一系列新作中去，且進一步強化了²³）。而另一個抗爭主題，即反都市崇尚荒原，則轉換了一種表現形式：《金牧場》是喧嘩都市與荒蕪高原並置對照，《金草地》則是讓浮躁的都市讀者在喧嘩背景下閱讀文本中的荒涼。究竟是因為作家太酷愛內蒙草地和伊斯蘭高原，所以才懷疑恐懼並抵抗浮華都市呢？還是因為作家反感仇恨（甚至是基於自卑的仇恨）都市秩序，所以才製造荒蕪的「他者」（The Other），以關懷、解救浮城廢都——這個令很多沈從文研究者困惑的悖論，在張承志身上，也未見得能迅速理出簡單的因果。

《金草地》對《金牧場》的第二個刪改重點是知青苦難。

《金牧場》裡的知青故事大致可分寫實與抒情兩個部分。前者包括「我」與小遐的戀情，「我」與「藍貓」的友誼，女知青「越男」因「血統論」壓力而嫁給牧民，知青頭戈切的複雜性格，以及李子葵、徐莎莎等知青的遭遇、掙扎和頹唐等等。這些故事在《金草地》裡基本上都被刪除了。而抒情部分則主要表達「我」與額吉（eji，蒙語母親或奶奶）的情感溝通，窮困的牧民在草原上大遷徙以及「我」對草原所得到的感悟。這些段落幾乎全部保留，其中牧民大遷徙更成為改寫後的長篇中唯一的情節主線。

張承志刪去那形形色色悲慘的知青故事，一則因為這些故事已在韓少功、王安憶、阿城、陳村、孔捷生、梁曉聲等人的知青文學中多側面地展示過了。張承志自己的《黑駿馬》和《綠夜》也早已被認為是知青文學發展中的重要文本；二則因為這些知青遭遇既和民族意識無關，也無法表達反都市文化的情結（學生在鄉村受苦，豈不反證城市進步？）

《金牧場》的結構已有其生命，刪除一些線索必然會影響乃至改變其他（被保留）部分的意義。比如第七章寫藍貓等知青絕望頹唐以酒澆愁，然後唱「知青之歌」，歌聲使「我覺得我心裡臭罵著自己才能忍住淚」²⁴。這段傷感文字在《金牧場》裡是裝嵌在幾段抒發紅衛兵豪情的回憶之中的。本來這「知青之歌」與紅衛兵模仿紅軍攀登天險臘子口恰恰構成互補的反諷關係。由於《金草地》抽掉了知青段落，於是紅衛兵的舊夢，就由可笑可愛可悲「淨化」為比較單純「可愛」了。《金牧場》的思想被單獨抽出來「堅持」「重申」時，其作品內涵的複雜性受到了削弱。

三 被保留和被重申的

在東京背景與知青故事這兩條被刪的線索中，《金草地》醒目地保留了「全共鬥」的歷史敘述，小林的歌詞，以及絕大部分與草原母親有關的抒情文字。

知青上山下鄉有不同方式。梁曉聲記錄的是兵團；陳村、史鐵生描寫的是插隊；而在張承志那裡，每個知青都單獨入住牧民家裡。雖然知青間仍聚會來往，但每日之食宿起居，都和牧民（而非其他學生）在一起。相對來說，最後這種形式，對城市學生的改造應該最為徹底。農（牧）民不僅成了學生的勞動夥伴「再教育老師」，而且也成了他們的家人（母親）。

但倘若這個牧民家庭已經太多孩子，他們可能並不真心歡迎一個學生住進來；或者，主婦本來就不喜歡孩子，何況非自願接受的「養子」？

然而，張承志好像沒有碰到這些情況。《金牧場》裡的額吉樸素善良，十分疼愛和理解她的「都市養子」。她年輕時曾是癱子，父親暴戾嚴厲，所愛的男人又是瞎子。艱難的身世使額吉變得剛強堅忍。她外表粗糙，表情冷漠，且十分迷信。但主人公「我」深深感受到這位草原母親的細心和柔情。作為一個二十來歲的英俊小伙子，他在額吉那裡得到的不僅是貧下中牧的教育、幫助，更是某種感性的啟蒙和「母愛」。小說裡有很多「戀母情結」的細節：他頑固地詢問額吉她過去是否很美；他反覆想像額吉從前有甚麼樣的男人；無論在額吉家裡或是主人公所敘述的自己的家庭裡，都有著成人男性（父親形象）的明顯空缺……「戀母情結」在當代中國自有其特殊的含義。男子愛著有「母親形象」的異性，母親形象聯繫著草原，遼闊草原以及河流山脈構成大地，大地山河意味著祖國，所以祖國便意味著母親，為兒子（們）所深情摯愛。所以二十年後張承志這樣概括他與額吉的感情²⁵：

（她是）主人翁的交流對象，影響者和教育者，一名偉大的草原女性，久經磨難但是不失遊牧民族本質，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國的關鍵時刻中，完成改造紅衛兵為人民之子使命的，中國低層人民溫暖和力量的象徵。

感情可以是私人的，語言卻是公共的。或許，這一代作家別無選擇，只能使用「毛文體」抒情。也可能是張承志的書寫策略，將青少年微妙心理迅速「昇華」為國家語言。但這裡有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人民之子」。既能養育「兒子」，「人民」當屬女性。「人民之子」愛「人民」，是否隱含著對「父親」不滿？而今日之「人民之子」，明天是否也可能成為「人民之父」？

《金草地》用刪節的方式對額吉形象作了兩處微妙的改動。一是在第十章全部草原故事結束後，作者突然改換筆調，用調侃口氣與讀者直接對話，並以後設敘述交代人物的結局。由於一改全篇的抒情視角，潦潦幾筆便傳神地畫出草原母親比較寫實的一面²⁶：

額吉活著。她現在是一個佝僂縮巴、動作含混的瘦瘦老人……她六十歲大本命年我回去那天，她顛巍巍一步一步地小跑過來。她不由分說不管我是作家兼學者她逮住我就是一個噁臉。我正不好意思呢她已經自顧自地走開了……

但是在《金草地》裡額吉的這一個既可笑又可愛的側影被裁掉，《金草地》中的草原母親形象就更詩化了。

另一處重要的刪改是第九章裡主人公與額吉的一次深夜對話²⁷。主人公在額吉幫著掖好被子後睡不著，一心想著額吉年輕的模樣。額吉好像洞見了「我」的失眠，叫他「別亂想啦！」「她突然發出的聲音嚇得我全身都抽搐了。」

……我這麼胡說八道你不生氣吧額吉？

唉，嗯。

……我覺得除了像你——額吉我是說，要是找不見像年輕的你那樣的老婆，我就當喇嘛！

住嘴！

額吉！

嗯？

你告訴我，既然阿勒坦·努特格是神的家鄉，既然阿勒坦·努特格那麼好，那麼我能在阿勒坦·努特格找到一個真正稱心的姑娘當老婆麼？

她久久沒有回答。我瞥見露出皮被的那頭蓬亂白髮也紋絲不動。

不能。吐木勒，額吉不說謊話。

我覺得心被重重刺了一下。

不能，孩子。額吉知道你是個不平常的人，可是阿勒坦·努特格只是片牧場。……

張承志之所以要在《金草地》刪去這段對話，不僅是因為這裡有著過於明顯的「戀母情結」跡象，而且也因這最後一句，額吉講了實話——足以點明張承志的全部草原神話。阿勒坦·努特格（「黃金牧地」）是小說中牧民大遷徙的目的地，在象徵層面上也是主人公的草原理想的終極。但額吉其實在告訴張承志：草原不屬於你，你也不屬於草原。草原牧場屬於平常人（人民？），而你是個不平常的人（人民之子？）。

其實，《金牧場》裡的很多場面，如不顧妻子生產而攀登冰川大稜，深入西海固皈依伊斯蘭殉道精神，在五彩雜色的都市只聽一個人的歌，而對著和服深情起舞的東洋美女動心不動欲……所有這一切不都在證明「你是個不平常的人」嗎？甚至，《金草地》所努力為之辯護、保衛的「紅衛兵理想」也必須聯繫「天降大任」（時代需要我們）的使命感才能解釋。作為「平常人」，依照「常理」，部分學生在領袖和軍隊支持下所成立的政治組織，有目的或無目的地侵犯他人的身體財物——這樣的行為和「熱情」，很難為之辯護。但作為「不平常的人」，不僅在信仰上，而且在實踐上也要反抗一切體制的束縛，為此不惜手段、不怕犧牲，所以儘管行為錯了，「反叛精神」還是可貴的²⁸。因此，從《金牧場》到《金草地》，刪改最少、保留最完整的，就是一群年輕紅衛兵模仿紅軍步行「長征」的故事了。

《金牧場》中的紅衛兵故事，並沒有展示紅衛兵最初在清華附中成立的情況（張承志本來最有發言權來討論紅衛兵的草創與初衷），對於掃四舊、抄家、打派仗等也只是跳躍式地虛寫，重點則放在幾個北京紅衛兵從大西南到陝西的「模擬長征」上。相對而言，這是首都紅衛兵最富理想色彩也最少傷害他人的一項行動²⁹。張承志後來說紅衛兵「好的方面是反一切體制」。但他小說裡的紅衛兵當然是無意反叛紅軍體制的（這個體制早在江西就已建立）。對《金牧場》主人公以及他的戰友大海、小毛等來說，長征是一個偉大的神話。他們的模仿對象，與其說是歷史事件的長征，不如說是在50年代以後由「革命歷史文學」所敘述所創造

的「文本」的長征。所以當小紅衛兵們不畏難險、胸懷豪情過白龍江尋找草地時，不僅他們的模仿行為頗戲劇性，而且他們模仿的對象就是戲劇。張承志在小說裡意味深長地點出了紅衛兵行動的諸多文章指引：《長征組歌》、《黑牢詩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小毛等甚至在四川草地迷路時靠回憶油畫《星火燎原》的細節和重唱歌曲《紅軍南下行》來尋找地理方位。而主人公出獄獲得女友浪漫迎接時的一段感慨，幾乎可以概括「紅衛兵長征」的全部歷史意義：「我滿意地覺得自己完全是在重覆著革命先烈的英勇活劇。」³⁰

張承志在1994年改寫《金牧場》時，不僅捍衛而且進一步純化紅衛兵的長征夢。大海為了實踐這個夢而死於越南。小毛、藍貓和「我」最後仍捨不得將降下的紅衛兵旗幟的原件送交博物館。《金牧場》裡也有一個和《靈旗》主人公青果老爹類似的人物，一個當年受傷流落的紅軍今日成了領救濟的窮漢。《靈旗》從這一「革命後果」質疑革命的方式（血流成河）以及革命的代價（是否值得）。《金牧場》裡本來有紅衛兵長征的豪情與知青頹唐的精心對比，也對「長征」的後果提出了類似的疑問。但《金草地》刪除了知青遭遇，紅衛兵的故事就變成浪漫讚歌了。

四 民族屈辱感與「人民之子」

簡單概括，《金牧場》全篇貫穿交錯著四個描寫失敗的故事：主人公在日本苦心研究中亞文獻，其學術報告最後在國際會議上被質疑；知青寫血書赴內蒙，最後頹唐潦倒回城；牧民千辛萬苦大遷徙，最後被取消在家鄉的「居留權」；紅衛兵長征追逐紅軍夢，最後亦在失望中降旗。《金草地》刪去了前兩個故事，保留了後兩條線索。歌頌失敗的英雄，強調追求過程大於目標——這一基本主題並沒有變化。但混濁世界煩躁心情被淡化了，浪漫舊夢和清潔的精神被突出了。以張承志的話來說，就是「放棄包括受結構主義影響的框架在內的小說形式，以求保護我久久不棄的心路歷程，放棄不真實的情節，以求堅持真實的精神追求」³¹。

混濁世界煩躁心情「不真實」嗎？是否只有紅衛兵舊夢和清潔的精神才真實？也許誇張浪漫舊夢強調清潔精神，其實正因為世界太混濁、心情太煩躁。

《金牧場》在歌頌失敗的英雄九死不悔的結構框架下，其實有兩條情緒主線，即民族屈辱感和反都市崇尚荒原。再細加辨察，這兩條情緒線索，又都連著張承志所努力守衛的「紅衛兵理想」。

《金牧場》第七章裡主人公「我」和夏目真弓小姐爭吵起來，「我」這樣為自己的粗暴態度辯護³²：

……「對不起。不過富國的人和窮國的人在一起時，窮國的人可以失禮。」真弓喊道：「為甚麼？！……」

「因為我們每天都感到……自尊心在受傷，」他的聲音啞住了，……

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宣言。為甚麼「窮國的人可以失禮」呢？這裡有幾種可能的解釋。一是假定「禮」（禮節、牌理、遊戲規則、文明秩序）只是由富國（權貴、上層、強者）所制訂的，因此窮國（貧民、底層、弱者）完全可以無視這種「禮」。這當然是一種反體制邏輯。但既然全盤否定了牌理，又何必太在乎在這種規則下的競爭結果（窮富強弱），並為之感到自尊心受傷呢？強調「窮國」（處在劣勢地位上）可以「失禮」，不是反過來肯定了「禮」

的重要？紅衛兵本來是特定體制的產物，當然很難真正反叛「一切體制」。激烈地反叛體制，恰恰證實了反叛者之重視體制。強調「可以失禮」，說明「禮」的意識很強。

第二種解釋是承認「禮」是窮富、上下、中外、強弱都無可選擇要共同參與共同面對的。既然富國（強權者）已佔了現實的優勢（包括制訂了「禮」），那窮國（貧弱者）理當有權利去懷疑、挑戰和破壞這個「禮」。所以在這裡，失禮（反叛）的合理性必須建築在反叛者的劣勢地位上——這是《金牧場》紅衛兵心態的關鍵所在。只有在「失禮」者處於劣勢地位，遭欺負受侮辱被攻擊時，他的激烈反叛精神才顯得浪漫美好。「紅衛兵理想」在張承志那裡，只有作為一種弱者的信念（宗教）才值得懷念和守衛。一旦這種信念付諸政治行動（「政治」當然要爭奪強勢），而在哪怕是局部暫時的強勢情況下（如第四章兩個「長征」途中的小紅衛兵「我」和藍貓，帶著替老紅軍報仇的道德義憤，用皮帶鞭打一個前國民黨兵），「失禮」（反叛）的性質就改變了。這就是為甚麼史鐵生在回顧紅衛兵運動時特別強調「理想價值」與「政治」之間的界線³³：

宗教……是一種理想價值，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恰恰是利用了人的理想價值來搞一種政治。宗教這種東西甚麼時候變壞了，就是當它被政治利用的時候。

作為「理想」的「反叛精神」一旦轉變為功利的造反行為，那也就顯示出了紅衛兵運動最「痞」、最阿Q、最「湖南農民運動」的一面了。其實張承志並不欣賞紅衛兵「貧民造反」的一面。《金牧場》裡凡寫到武鬥、抄家、暴力、派仗等，都十分隱晦含糊節制且不無警惕和批判。如前面所說長征途中的那次打人，作家細細分析自己初次宣泄暴力時的快感與緊張³⁴：

這皮帶堅著的時候濕淋淋的，分量像重了一倍，那顫抖是心中的憤怒的火焰的顫跳……我把濕透的皮帶掄得呼呼作響。大海也在暴跳怒罵，也在閃閃發光地掄著他那一根。關隘就這樣渡過了，簡單而殘酷。我開了這輩子的打戒。

在第九章裡，面對真弓的非暴力主義理論，主人公又在內心回顧自己三次打人的心理經驗：「我的罪就是我自己。……歷史的一切罪惡也都潛伏在我的肉體上。」「然而，……我說我是罪人並不是說我已經犯過罪孽，……」「我知道我為了母親可以殺人放火。如果是在清朝，如果我活在左宗棠製造了一條血河の世道，為了母親我要滅他左宗棠滿門！」³⁵這真是一面感到負罪內疚，一面仍堅持革「命」的精神。也許這並非是紅衛兵的懺悔³⁶，但像這樣的幾段反省暴力的文字，在《金草地》裡也被刪掉了。另外在《金牧場》第六章還有段關於北京街頭痞子哥兒們如何燒車鬧事、「暴亂」示威的描寫。《金牧場》的主人公有些認同「痞子們」的反：「也許小痞子、楞頭青、小胡同串子們就這樣粗野地撕下了歷史舊的一頁……他覺得他從此和北京痞子之間建立了不能割斷的情誼。」³⁷但在《金草地》裡，作者就有點閃爍其詞不肯表態了。他只是警覺地思索：「革命運動是甚麼？人民是甚麼？歷史是甚麼？」³⁸

張承志要在紅衛兵的政治行為中辨析其間某種非功利的青春熱情和浪漫理想，他就必須為紅衛兵的「失禮」尋找新的價值支柱。「紅衛兵精神」既根植於自下而上的弱者處境（學生批老師、群眾鬥領導、子女「背叛」父母……），又同時必須擁有自上而下的道德優勢（「你們高貴者最愚蠢，你們受蒙蔽了，你們是行屍走肉，平庸墮落……」）。張承志在《金牧場》所尋找的道德支柱，第一是長征傳統，第二是草原大地，第三是伊斯蘭教哲合忍耶精神

（後來在《心靈史》裡有重大發揮）。三種道德資源都具備弱者劣勢條件：紅軍明明已掌握政權，學生們還要模擬「潰逃」；貧下中牧名為社會主人，生活卻苦如奴隸；哲合忍耶更是在歷史上屢遭扼殺的教派……。這些「弱者」的反叛其實都在挑戰中確認了強者的「禮」：長征就是為了政權；牧民認定知青並非「常人」；回民也樂於見到他們的秘密被寫成中文（甚至，主人公「我」在日本，也要借用國際學術會議來完成他個人的「青春的祭典」）……。

劣勢地位和優勢道德，這是張承志在《金牧場》裡將「紅衛兵精神」理想化的兩個關鍵。劣勢地位，雖然也表現在紅衛兵入獄、異國屈辱等細節上，但最重要的，還是草原的煉獄過程。在優勢道德的資源方面，雖有來自名稱（「紅」衛兵）的革命傳統，以及在異國激發的民族意識，但更主要地，還是在草原大地上額吉（人民）的培養。額吉的形象所以至關重要。她的主要功能，便是「改造」紅衛兵為「人民之子」。其方法就是在幫助紅衛兵忍受克服種種「平常人」難免的苦難磨煉之後，再告訴這個紅衛兵：「你不是一個平常的人。」換言之，這是先做「人民」，然後成為「人民之子」³⁹。被張承志反省的紅衛兵行為雖近乎貧民造反，但他所維護的紅衛兵理想卻聯繫著士大夫的救世使命感。張承志評論魯迅省卻姓名直呼「先生」，雖然「先生」企圖以進化論或尼采哲學或俄國人道主義來救救孩子，而張承志是企圖以草原西海固大柁哲合忍耶來拯救墮落的中華，但救世責任卻不無相通之處。只是，文學家救世，自知功效有限；而紅衛兵救世，倘若從個人信念（宗教）化為政治行動或道德批判，後果值得懷疑。

冥冥之中，張承志的主人公始終在等「神奇的召喚」，他曾這樣自言自語地領受荒原、人民和大陸給予他的崇高使命⁴⁰：

莽莽綿還的大陸，穩穩壓住了世界重心的大陸，孕養文明改換風流的大陸，它正屏息凝神地望著你，雄渾浩大的它正注視著你。

……你把結束當成了開頭，把生命交付給了道路，你又走進了你的大陸，你去別了你的休息和安寧。

你是大陸的兒子……。

注意，這是《金草地》的版本。在《金牧場》裡，最後一句是「你是大陸的驕子」。

註釋

1、27、31 〈註釋的前言：思想「重複」的含義〉，《金草地》（海南出版社，1994），頁1；4；4；4。

3、10、12、13、17、18、19、20、26、27、32、34、35、37 《金牧場》（北京：作家出版社，1987），頁410；12-13；23；282；101；270；98；98；484；430；345；158-59；456-57；278-79。

4 韓少功最典型的知青小說是《飛過藍天》和《歸去來》，四川文藝出版社在1986年出版的《知青小說選》收錄的是《遠方的樹》。

5 這個短篇曾被選入多種選本。1993年12月中國文學出版社的《中國新時期文學精品大系·短篇小說卷》便以《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為題。

6、8 蕭夏林：〈無援的抗戰——張承志和他的抗戰文學〉，見《無援的思想》（北京：華藝出版

社，1995），頁142；142。

- 9 《抵抗投降書系》（北京：華藝出版社，1995）的編者將張承志列在「當代文學英雄」的首位：「張承志，這位拼命硬幹的理想主義世界幽靈。以『雖千萬人我往矣』的英雄氣概獨步天下，在荒蕪的英雄路上，慷慨悲歌。他用生命巨筆，血寫《心靈史》這部英雄和信仰的史詩，舉念信仰的神聖，反抗的無畏。在以恥為榮後現代的喧囂中，在後庭花的大合唱中，以筆為旗，直戳文壇的黑暗，直搗當代文人的卑鄙，倡揚『抗戰文學』，呼喚清潔的精神，呼喚高貴自尊的文學，他的一篇篇抗戰美文巨大地震撼了這個滯悶的時代。」見蕭夏林：〈時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寫在《抵抗投降書系》的前面〉，見註6書，頁1。
- 11 《金牧場》第二章J部曾描寫主人公在後樂賓館的斗室裡背誦伏契克的詩句：「從門到牆是七步，從牆到門也是七步。」（頁46）。
- 14 夏志清原著，劉紹銘編譯：《中國現代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社，1979），頁52。
- 15 郁達夫的《沉淪》後來被認為是愛國小說，但該書在1921年初版時，作者自稱只是「描寫著一個病的青年心理……裡面也敘帶著現代人的苦悶」（《沉淪·自序》）。然而過了十年，在「九一八」事件以後，郁達夫嘗試重新解釋自己的創作：「……正是在日本，我開始看清了我們中國在世界競爭裡所處的地位……是在日本，我早就覺悟到了今後中國運命，與夫四萬五千萬同胞不得不受的煉獄的歷程」（《懺余獨白》）。
- 16 「您還回中國嗎？」六個字採用不同的字體印刷。見《金牧場》，頁49。
- 21 「人民的暴力主義」是張承志《心靈史》中的一個標題，見《回民的黃土高原——張承志回族題材小說選》（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298。
- 22 張承志創作中的「男子漢氣概」早就為包括王蒙在內的很多評家所注意。現抄錄朱偉的一段原意是讚揚張承志的文字：「一位女編輯說：『如今那麼多人都在那裡裝男子，裝來裝去，還數他最像。』」見朱偉：〈張承志記〉，《鍾山》，1994年，第1期。
- 23 《清潔的精神》（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封二有如下介紹：「這本散文集只是我的橫掄堅砍，沒有開仗也沒有休戰……我雖然屢屢以反叛中國式的文化為榮，但在列強及它們的幫兇要不義地消滅中國時，我獨自為中國而戰。」
- 24 《金牧場》，頁313。文中的「知青之歌」，是按文革期間一首真實流行的「南京知青之歌」改寫的。這首「南京知青之歌」曾在知青中廣泛流傳，後因在蘇聯「莫斯科之聲」上播出，原作者被捕入獄。
- 25、29 見註1，頁3。張承志後來在接受採訪時說，他曾住過的那一家牧民，因為出現在他的小說裡，「後來沒有人不知道他們家，也出名了」。見梁麗芳編：《從紅衛兵到作家》（台北：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5月），頁196。
- 28 張承志說過：「紅衛兵最可貴的是反叛精神」。同上書，頁139。
- 30、38、40 《金草地》，頁104；第56節；第42節。
- 33 〈史鐵生：輪椅上的命運挑戰者〉，見註25梁麗芳，頁112。
- 36 紅衛兵的懺悔，在文革後的中國文學中並不多見。除非是作為沉默的群體（他們），紅衛兵通常被形容成粗野暴力愚昧法西斯。否則，凡是從主人公角度寫紅衛兵，大都同情多於批判、理解多於責備、辯護多於懺悔。對於昔日的「錯」，張抗抗認為「懺悔也是沒有必要……懺悔是沒有用的，錯了就是錯了，是當時必然要犯的錯誤。」（見註25梁麗芳，頁183）連坐在輪椅上的史鐵生也覺得「有些人把一切罪惡都推到紅衛兵身上，簡直不公平了。好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把許多罪責推到士兵身上，是荒謬的。」（同上書，頁104）不過史鐵生忽略了一點：紅衛兵並不是士兵。士兵和學生一樣，是職業，紅衛兵也許更像衝鋒隊——大規模的群眾組織，曾真心擁戴、幫助納粹上台，後來因與軍隊有矛盾被希特勒解散，結局頗慘。
- 39 梁曉聲、張抗抗也都說，若沒有知青下鄉的苦難，他（她）們便都不會成為作家。王安憶對此回答說：當作家也不算甚麼，「如果要我下鄉才當作家，我寧可不當」。參見拙作：〈為文學所敘述的「文革」〉，《明報》1996年5月15日。

許子東 原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曾先後任香港大學中英文化基金（Sino-British Fellow）和美國芝加哥大學魯思基金研究員（Luce Fellow）。1993年起任教於香港嶺南學院中文系。著有《郁達夫新誨》、《當代文學印象》等。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1996年10月號總第三十七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